

书缘书话

随史铁生去地坛



《我与地坛》
史铁生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■连云港师专一附小 丁佳

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，我时常感叹并羡慕当下学生们的阅读大环境。我的阅读起步很晚，到了高中，才算真正钻进了书堆。那时，尽管要备战高考，但我仍每周乘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往返于学校和图书馆之间。如此，我每年都能阅读超过30本书。直至今日，看书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。促使我发生重大转变的，正是史铁生先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。

那时我上高一，作为语文必读篇目的散文《我与地坛（节选）》第一次撞进了我的生命。课堂上，老师像往常一样给我们展示与课文相关的图片，介绍文章作者的生平……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，面露微笑，虽然从21岁起就离不开轮椅，但他的笑脸从容舒展，让我久久无法转移视线。其后的一个午间，我在杂志上读了完整的《我与地坛》，沉浸在他的作品中，一时难以平复。他作品里流露出的细腻情感和对生命的思考，使我迫不及待地想与他进一步深入“交流”。

史铁生的一生很坎坷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这一生“职业是生病，业余在写作”。

史铁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。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。1969年被安排去延安一带插

队务农，落下腿疼的毛病。1972年因双腿彻底瘫痪回到北京。1981年突发肾衰竭，随后开始专心写作。1998年情况恶化为尿毒症，靠着每周3次透析维持生命。

短短100字的简介，却是九死一生般曲折。史铁生曾在《我二十一岁那年》里回忆道：“那时我还能走，走得艰难，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。”他常常使用轻描淡写的语句来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，而这种轻描淡写，甚至是自嘲或幽默，像是标志，也像利剑，成为其作品的鲜明风格。

从《我与地坛》到《想念地坛》，从“两条腿残废的最初几年，我找不到出路，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，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，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”到“要是有些事我没说，地坛，你别以为是我忘了，我什么也没忘，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。不能说，也不能想，却又不能忘”，再到“我已不在地坛，地坛在我”，地坛从一个遁世之所变成了史铁生的寄托，变得与史铁生不分你我。

其实史铁生作品中最触动我的，是他对生命、生活、生存含义的思考，这些思考富有深度、带有哲理色彩，常常带我进入一个冥想的世界思考自己、思考人生。《我与地坛》中写道：“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，来陪伴我。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，第二个是为什么活，第三个，我干吗要写作。”

活在今日社会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巨大压力，在经历挫折、遭遇不幸时，许多人做出了最艰难也最容易的选择——死。史铁生像常人一样曾有过轻生的念头，“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，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”。然而，“先去死，再试着活一活看”的决心不久后就占领了他，“一个人，出生了，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，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；上帝在

交给我们这件事的时候，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，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”。

在《我的梦想》中，史铁生记录了第三个问题的答案——写作：“作小说的人多是白日梦患者。好在这白日梦并不令我沮丧，我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史铁生太令人沮丧，才想出这法子来给他宽慰与向往。”

反观史铁生叩问生命与追寻希望的历程，不得不提的便是他的母亲。其实，史铁生的作品中提及母亲的并不多，但只言片语足以撼动人心。

双腿瘫痪后，史铁生依靠母亲的照顾度过了那几年“不懂事”的日子。“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，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，从那园子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。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，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，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。”正是这“犹犹豫豫地想问而不敢问”，让人读及便禁不住潸然泪下。回想40岁便去世的母亲，史铁生痛彻心扉、追悔莫及：“那段日子里——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日子，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，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：‘你为我想想。’事实上我也真的没有为她想过。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，还来不及为母亲想，他被命运击昏了头，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，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是要加倍的。”

伏尔泰说过：“当我们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，我们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；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，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。”史铁生的作品是需要平淡的心境下去阅读的，在你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时候，捧起他的书来，通过文字与他交流，他会让你富有勇气。在思想和文字的领域，史铁生不仅不残疾，甚至比你我更健康。

提及“士”，首先印入脑海的是像范仲淹这样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悲悯文人，或者是寒窗苦读、只期一朝中第的寒门学子。往近处，则会想到梁漱溟与汪曾祺两位老先生的腰杆与笔墨。笔者对“士”其实是有着刻板印象的，但在通读了《中国古代士文化与知识分子现代化》之后，方才发觉，中国“士”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2500年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。

《中国古代士文化与知识分子现代化》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的“士”，从先秦游士到现代化进程中的“士”。通俗意义上来说，“士”会被解释为当今社会认为的“知识分子”。不过，因其本是一个复杂多义的概念，故不能仅仅特指某一个阶层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们共同自应承担的任务，自始至终都是文化、思想的传承与创新。从早先的士大夫阶层，至贵族底层，至平民顶层，再至知识分子阶层，经历了不同身份变化的“知识分子”，不是泛指所有拥有知识的人，而是指具有原本“士”的精神概念甚至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。根据学术界的理解，这样的人群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，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、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，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（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）私利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孔子时期就已对“士”的概念进行了发现与总结：“士志于道”，指明“士”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；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这样的初始教义深深影响着世世代代的“士”阶层，而且愈是在“天下无道”的时代，愈彰显出它的力量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士”经历了不断解构、重组与发展的过程。纵观国学文化的发展，不同朝代的思想家都会对此提出不同的见解，也会影响当时和后来的学人。在笔者的认知中，提及“士”，绕不过的一个词便是“气节”，仿佛这是对一个士人或者读书人的除却学术以外的最高赞美词——气为敢作



《中国古代士文化与知识分子现代化》
孙述民 蒋玉兰 著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敢为，节为有所不为。

“士”向“知识分子”的最终转变在科举制废除之后逐步完成。清末开设学校，教员和学生日益增多，并逐步形成一个个团体，其中不少人开始走向革新与革命运动之中。思想解放和民主意识慢慢占据年轻人的头脑。在实际由军阀统治的民国阶段，意识到自己主人翁身份的在野知识分子，由于当权者的腐败，反而逐渐赢得民心，开始具备“士”阶层所不敢想象的力量和西方新文化带来的思想解放，试图带动社会的变化，但绕不过的是，这样的力量始终是欠缺的。即使他们拥有了凝聚群众的领导力，但是群众立身的基础是吃饱穿暖，单纯思想的富足却没有这样的作用。同时，他们没有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，所有的进步与改变会轻易地被现实击垮。失败后的这一代“知识分子”虽不至于销声匿迹，但也渐渐泯然众人了。

总有人眼中带光地回忆往昔，赞士人的高风亮节，鄙当今人的俗气。也有人试图将后来的工人运动与“士”相联结，若真是这样，对原本的“士”阶层而言，都是极为狭隘的。也有人会说，10年的文化断层已让“士”阶层完全消失。如果对“士”抱有固有的、消极的观念，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错的。但若以积极和极具生命力的变迁视角来看待，那么“士”更多地会以新的阶层形态融于当今社会之中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新一代“士”与知识分子阶层极为重要，理解与发展，才是新一代“士”出现的根本。

『士』之于中国文化

■南京大学 吴沫

广告

敬请关注官方网站
www.jsjybwg.com

江苏教育博物馆

(数字馆)

展示江苏教育成就的窗口
 传承江苏教育文化的中心
 研究江苏教育历史的平台

苏教溯源 ■

苏教溯源
江苏教育史上的若干个第一

人物厅 ■

实景厅 ■

苏教溯源 ■

人物厅 ■

江苏省教育厅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主办